

清初臺灣的請墾制度與熟番地權 (1684-1724)

李文良*

清廷領臺後的土地開發採行「請墾制度」，只要非屬民番的「荒地」，百姓即可向所屬知縣提出申請，經確認無礙民番，即可取得墾照、告示等文件，招佃前往拓墾，最後再由官府派遣書役丈量陞科，成為民業。雖然如此，請墾制度在康熙年間因為法規之不同，而有「募墾」、「報墾」以及「勸墾」的差別。更重要的是，請墾制度的差別反映了臺灣農墾、商貿以及社會的階段性發展。清領之後積極的招民墾荒政策，在康熙五十四年夏天有了急遽的轉變，在皇帝突如其來的全臺皆屬番地之指示下，地方官員只能在朝廷新規與社會拓殖熱潮之間，尋求妥協之道。由於「荒地」現在被等同於「熟番地權」，制度上的墾荒主角須從漢民轉變為熟番，同時凸顯熟番地權。這就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二年期間，臺灣突然發展起來的「生番歸化」以及「賤墾番地」的新模式，而兩者均凸顯荒地屬於熟番地權。而這也告訴我們，要討論清初治臺政策，不能簡單使用「封禁」與「開發」來對應康熙或雍正等朝代。

關鍵詞：請墾制度、熟番地權、治臺政策、康熙、民業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我們現在對於清初治臺政策，仍然時常存在著一種似是而非的看法，認為清廷對臺採取「消極治臺論」，並在此一核心觀點的前提下來討論清初的軍事制度、移民以及開發政策，例如班兵制度、禁止築城、武器管制、禁止攜眷、移民管制，和以劃設番界為核心的封禁政策。¹更有甚者是，將「移民管制」擴大解釋為「禁止漢民渡臺」，或者是以清前期朝廷積極擬定政策鼓勵招民墾殖的四川作為對照，凸顯臺灣相對顯得消極與保守，主張「清初對臺治理特殊化論」。²「消極治臺論」看來也不僅局限於解釋清初，而是背後有著一整套的清代臺灣歷史架構。如眾所周知，論者亦常以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為契機而展開的開山撫番為界，強調清廷的治臺政策從原本的消極封禁急遽轉變為積極開發，從而將清代臺灣史硬切為消極、積極兩階段的分期架構。³

雖然如此，近年來其實已經有相當多研究，積極反省前此的治臺政策研究。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的專書《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

¹ 關於清初治臺政策，可參閱施志汶，〈清康熙三朝的治臺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消極治臺論」說法的源頭之一應該是伊能嘉矩(1867-1925)。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臺北：南天書局，1994，據刀江書院1928年版影印)，中卷，頁769-770。

² 劉正剛，〈清前期四川和臺灣移民政策之比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成都，1996)，頁90、95。湯熙勇同樣以臺灣與四川做比較，卻得出不同的結論。湯熙勇，〈論清康熙時期的納臺爭議與臺灣的開發政策〉，《臺北文獻(直字)》，114(臺北，1995)，頁25-53。

³ 代表性的著作是張世賢，《晚清治臺政策(1874-1895)》(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

1800)，更從平埔族的主題入手，經由紮實的史料整理分析，極具說服力地向我們展示了，清廷如何理性計算地方的稅收、控制成本，靈活調整其對邊疆臺灣的治理政策。⁴事實上，單就移民拓墾的課題來說，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後，不管是朝廷或臺灣現地的文武官員，為了增加稅收、穩定社會秩序，很快就在臺灣推行請墾制度，積極招徠墾民、鼓勵開發，幾乎持續了一整個康熙年間(1662-1722)。例如，首任諸羅知縣在一份標示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也是現存最早的清代請墾文件上批示：「墾荒，現奉上令，准速給照」。首任臺灣總兵楊文魁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任滿將離臺之際亦曾回顧說：臺灣「靡蕪極目，藉人耕墾，始無曠土」，當時「雖有司牧力為經理」，「奈阻於洪濤，招徠不易」。康熙二十九至三十三年間(1690-1694)任諸羅知縣的張珩：「見邑治新造多曠土，招徠墾闢，撫綏多方，流民歸者如市」。⁵誠如湯熙勇所批評，清初不少駐臺官員曾積極招徠墾民，致力開發，實非過往「消極政策」一語所能簡單涵蓋。⁶因此，重新評估清初各級官員對臺的開發政策，應該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清初治臺政策，甚至是清代臺灣整體的歷史。

雖然我們習慣將清初土地開墾政策通稱為「請墾制度」，但其政策名稱與內容，卻可能因年代先後而有些微的差異。有一份尚未被注意卻重要的史料是乾隆十七年(1752)編修的《重修臺灣縣志》，其〈賦

4 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5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3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127-128。

6 湯熙勇，〈論清康熙時期的納臺爭議與臺灣的開發政策〉，頁34-35。施添福也很早就指出清初這些積極招墾政策。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頁41、44-45。

役志〉的田賦項在登載轄內新墾陞科田園面積時，特別將清領之後每年「新墾」陞科之田園，再細分為「募墾、報墾、勸墾」，以及「里民自實」四種。⁷(參閱附錄、表1)雖然就筆者管見，目前僅有《重修臺灣縣志》特別如此記載，卻並非誤寫，而是編者曾依據官府檔案，刻意區分標示的結果。⁸就清代官府文書的特性而言，文字的細微區別通常反映著法規的差異，而法規常常是政策與社會變動下的產物。⁹因此，即使同樣都是新墾陞科田園，卻需要清楚登記「募」、「報」、「勸」，以及「里民自實」之別，不可混淆。換言之，即使我們現在缺乏康熙年間臺灣官府的詳細檔案，卻仍然可以從此一登錄新陞田園的詞彙差異，來觀察康熙年間官府對臺灣土地開發的政策與社會變化。

7 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10-11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191-193。

8 清代其他方志沒有仔細記錄到募、報、勸墾的差別，主要應是制度上沒有稅率上的差異，而且清代在整體的陳述上，是用「清代 / 新墾」來相對於「明鄭 / 舊額」；強調明鄭「舊額田園」，是清初涉及田園處理時的慣用語。正因為如此，清代方志登錄請墾新陞土地，最終就是簡單化為「新」、「舊」墾之別。

9 類似的土地分類差異，在番屯制度也可以觀察得到。陳志豪，〈清代臺灣的番屯制度與墾莊建構——以竹塹地區的九芎林莊為例〉，《臺灣史研究》，20：2(臺北，2013)，頁1-30。

表 1 清初臺灣縣新墾田園(1684-1747)

年度別	新墾名稱	面積(甲)	年度別	新墾名稱	面積(甲)
康熙二十四年	新墾	418.214	康熙四十一年	勸墾	13.700
康熙二十五年	募墾	116.385	康熙四十五年	報墾	7.600
康熙二十七年	募墾	332.049	康熙四十六年	報墾	3.550
康熙二十八年	募墾	99.951	康熙四十七年	勸墾	28.809
康熙二十九年	募墾	211.839	康熙四十八年	勸墾	1.130
康熙三十年	募墾	87.831	康熙五十一年	勸墾	1.500
康熙三十一年	募墾	190.133	雍正六年	首墾報明	106.319
康熙三十二年	里民自實 新墾	303.341	雍正七年	里民自實 新墾	64.285
康熙三十二年	報墾	26.320	雍正八年	報墾新墾	47.638
康熙三十五年	報墾	33.710	雍正十一年	新報開墾	2.756
康熙三十六年	報墾	104.162	雍正十二年	續報開墾	7.300
康熙三十九年	報墾	11.140	雍正十三年	報墾	50.807
康熙四十年	報墾	9.960	乾隆十二年	里民自實 新墾	2.092

資料來源：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頁 191-193。

說明：未包含因行政區域調整割歸臺灣縣管轄之田園數據。

二、「募墾」(康熙二十五至三十一年, 1686-1692)

因為目前缺乏清初臺灣官府的檔案及法規集，我們只能根據現存少數的契約文書及文獻，來推斷「募墾、報墾、勸墾」之不同，及其可能反映的政策與歷史意義。首先，「募墾」只出現在康熙二十五至三十一年間，應是清領之初官府主動招募。「募墾」的法律來源，則跟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有關。根據新近才重新出土的季麒光個人文集《東寧政事集》的記載，季知縣來臺履新後不久，即向福建總督王國安(1642-1709)詳陳臺灣應行事宜六項建議，其中第二條為「招集丁民」：

臺灣自偽鄭歸誠以後，難民丁去之，閒散丁去之，官屬兵卒又去之。卑縣設法招徠，雖時有授廩附籍之人，然重洋間隔，聞多畏阻而不前。況南北艸地，一望荒蕪，得人開墾，可成沃壤。合無請照昔年奉天四州招民之例，酌議名口，就現任候選官員，或紀錄，或加級，廣勸召募。在貧民有渡海之費，相率而前。到臺之日，按丁授地，並將偽遺生熟牛只，照田給配，按三年起科之令，分則徵收。不特人民彙集，抑且野無曠土，田賦日增，國勢軍需有攸賴矣。¹⁰

季麒光建議的具體辦法是，給予包括「渡海之費」、「按丁授地」以及配給牛隻等三項補助，目的在於增加墾民渡海來臺之誘因。由於後兩項的資助主要是從臺灣本地既有的資源來挪給，可能會有問題的是支給移民的「渡海之費」，從何而出？仔細推敲文意，季麒光應是希望此項費用是由民間而非官府支出，具體的辦法則是號召「現任候選

¹⁰ 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頁178。

官員」，官府的回報則是依「現任候選官員」出資之多寡，予以加級、紀錄等榮銜。官府為了籌措推動事業所需的資金，以榮譽職銜交換有力之家的大筆捐款，是明清時期常見的做法；官民雙方各取所需，社會踴躍捐輸。¹¹

由於季麒光也明確建議援引「奉天四州招民之例」，我們也可就此成例來觀察。關於「奉天四州招民之例」，中國學者劉正剛曾指出，奉天並無「四州」之轄屬，疑其為「四川」之誤，原文應為「奉天、四川招民之例」。¹²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撫張德地(?-1683)奏准獎勵招民有成效之官員：「無論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縣者，量與紀錄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與紀錄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論俸滿即准升轉」；三年之後，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1633-1699)奏請「敕部准開招民之例」，同樣得到朝廷的批准，內容是「候選州同、州判、縣丞等，及舉貢、監生、生員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職之銜，使之招民」。¹³朝廷同意執行招民開墾者，從現任文武官員，一路擴及候選官員和獲有各級科舉功名等「有力招民者」；而願意出面招民者則可獲得「紀錄」、「署職之銜」，有利官場晉升。

雖然目前沒有檔案文獻可供說明，福建當局是否接受季麒光的建議，並上報給朝廷議決施行。¹⁴但不管如何，季麒光跟省級官員的關係應該十分良好。只要稍加閱讀季麒光的詩文集就可輕易瞭解，草創

¹¹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¹² 劉正剛，〈清前期四川和臺灣移民政策之比較〉，頁90、95。

¹³ 轉引自劉正剛，〈清前期四川和臺灣移民政策之比較〉，頁88。

¹⁴ 劉正剛曾斷言季麒光的建議並未獲准，卻未提示證據。劉正剛，〈清前期四川和臺灣移民政策之比較〉，頁95。

之際涉臺政策的溝通和調整，季麒光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追隨季麒光來臺的核心幕僚鄭廷桂，在為《東寧政事集》寫的跋文中就說：「幸制府王公委心信任，凡所條議，無不允行」，並稱季氏「定東寧新闢之章程」。¹⁵

此外，儘管我們目前也還不清楚，根據季麒光建議的事項，「候選現任官員」究竟只是單純捐出資金即可，還是涉及了實際的土地經營以及稅收繳納事宜，亦即成為官府土地稅收帳冊上的業主。但不管如何，百姓依據請墾制度向縣官請准拓墾荒地、進而成為業主，卻在此後的臺灣被廣為施行。事實上，現存最早的一份請墾文獻正是領臺翌年的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由明鄭時期著名流寓文人沈光文(1612-1688)之子沈紹宏(?-1744)，就諸羅縣鹿野草荒埔(今嘉義縣鹿草鄉)提出的請墾案，當時迅速批准的人應該就是季麒光。季知縣的批示也講得很清楚：「墾荒，現奉上令，准速給照」，表明臺灣的請墾制度已獲上級批准。¹⁶此外，現存為數不多的康熙年間請墾文件，其出面承墾土地者確實常見具科舉頭銜者。¹⁷

康熙六十年(1721)隨清軍來臺平定朱一貴事件的藍鼎元(1680-1733)，曾親自巡查各地，留下許多珍貴記錄。他注意到，當時諸羅縣的大埔庄(今臺南市白河區草店里)，已有廣東潮州府民墾成三十餘甲的田園，卻

¹⁵ 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頁147-148。

¹⁶ 關於沈紹宏請墾鹿草庄，可參閱李文良，〈民田與請墾制度——清初臺灣田園的接收與管理〉，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頁27-56。

¹⁷ 尹章義是最早提出科舉社群與臺灣開發關係的學者。尹章義，〈臺灣←→福建←→京師——「科舉社群」對於臺灣開發以及臺灣與大陸關係之影響〉，收入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527-583。

尚未清丈陞科。藍鼎元還進一步提及，這個地方原本是熟番哆囉囑社的產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社餉、招客民墾之者也」。¹⁸

目前並沒有李貞鎬的詳細資料，但學界傾向於認為他就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臺灣縣籍武舉人王楨鎬。¹⁹理由是清代方志大都記載為「王楨鎬(解元，本姓李)」或「李楨鎬(第一名，榜姓王)」。這表示，王楨鎬原來應該是姓「李」，不知道是過繼給王家還是冒名，他在科舉榜單上的姓氏卻寫作「王」。十八世紀中葉編修的《重修臺灣縣志》還提及，李楨鎬在縣內永康里擁有一座漂亮的知名園林「聚星亭」，據稱「綠疇四繞，青嶂當窗」，懸掛有臺灣知府倪象愷(1685-?，雍正七至九年[1729-1731]任)題為「聚星」的贈匾。即使到了十九世紀末庭園已經荒廢，文人們聞知時還是嚮往不已。²⁰李楨鎬的父親是「鄉飲賓」李文奇，還有兩位叔叔李文旦和李文登，三人都活到九十幾歲的高齡，縣志將其列為「耆壽」。²¹顯然李氏家境富裕、政商關係良好，家族勢力龐大。

跟聚星亭一起被收錄在《重修臺灣縣志》的園邸其實只有六座，分別是「明寧靖王朱術桂園亭」、「鄭氏為其母董氏建」的「北園別館」、「參軍陳永華所築」的「陳氏別墅」、明隆武舉人李茂春來臺

¹⁸ 藍鼎元，《東征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83。關於哆囉囑社，可參閱洪麗完，〈族群互動與遷徙、擴散——以清代哆囉囑社人遷徙白水溪流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8：4(臺北，2011)，頁1-55。筆者推測：大埔庄應是由李家以荒地名義向官府請准開墾，時間則早於康熙五十四年。

¹⁹ 戴文鋒主編，《東山鄉志》(臺南：東山鄉公所，2010)，頁89、352。

²⁰ 蔣師轍，《臺游日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79；連橫，《雅堂文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0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251。

²¹ 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頁520、702。

後修建的「夢蝶園」，以及曾為明鄭「勇衛黃安故宅」的「棧仔林」，其倡建者皆為明鄭時代顯赫一時的貴冑名將或學人。²²儘管「聚星亭」被列在六座園林之末，依然可以窺見李家在清初臺灣政治和文化圈內的超凡地位。十八世紀重修臺灣縣志時，其他五座園邸大都已经圯廢或改為寺廟，唯獨李家的聚星亭依然安好。閱讀《重修臺灣縣志》園邸項的記載，很容易就會讓人感覺：李家早在明鄭時期就已在臺灣拓墾定居，儘管歷經明清政權轉換的戰亂，一整個清代仍然持續在臺經營，成長茁壯。

李貞鎬家族及其拓墾經歷，看來跟康熙二十四年請墾諸羅縣鹿野草的沈光文家族類似。沈家主要的據點是舊稱為目加溜灣的今臺南市善化區，他們經由請墾制度取得明鄭時代由軍隊屯墾的「鹿野草荒埔」之墾權，該地大概在沈家居住的善化北方 40 公里處。李貞鎬家族的聚星亭則位於「臺灣縣小東門外，近鯽魚潭」，有學者推測是在「永康里甲內社，今網寮村二王」。²³果真如此，武舉李貞鎬招墾的大埔

²² 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頁 698-702。

²³ 石萬壽主纂，《永康鄉志》（臺南：永康鄉公所，1988），頁 799。《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收錄一座標示為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墳地盜葬示禁碑」，編者註明該碑「原勒臺南市東區石頭坑（雍正間李氏聚星亭故址）」。

然從清代文獻記錄看來，聚星亭比較可能是在虎尾寮山東側，而非柴頭港溪上游的石頭坑。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477；雲海龍吟，〈柴頭港溪「石頭坑」探索〉，<https://c931011106.pixnet.net/blog/post/232143911>，擷取日期：2020 年 12 月 11 日。此外，荷治晚期的耕地圖，在鯽魚潭西側繪有一座園邸，是否與聚星亭有關，頗值得注意。蘇峯楠，〈〈赤崁耕地圖〉所描繪的 17 世紀中期臺南地景及其歷史空間〉，收入劉益昌、Ann Heylen（賀安娟）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早期南瀛》（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頁 64-65。

庄就位於聚星亭北方 50 公里處的山邊。從清初沈家的案例看來，李貞鎬家族確實可能控制離家偏遠的大埔庄墾權。

清領初期參與荒地請墾的科舉功名者，最著名的案例應是號稱為「臺郡開科舉人」的蘇峨(1637-1698)，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請墾諸羅縣「茅港尾保龍船窩庄草地」(今臺南市官田區南廊里)。²⁴蘇峨是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住家地址不詳，但其墓園位於「翔風里十四都後倉保洋塘鄉」，即今廈門市翔安區洋塘，離海不遠，距廈門市、南安約僅 20 公里。據說，蘇峨從小天資聰穎，卻「屢試未遊泮」，遂「為浮海計」。他將家庭及產業完全託付給妻子照料，單身前來臺灣。²⁵蘇峨後來就順利以鳳山縣生員的身分，在康熙二十六年考中清廷特地為臺灣府保留唯一的舉人員額，儘管此時他已是 50 歲的高齡。兩年之後，家庭在福建同安、學籍在鳳山的蘇峨，卻取得了北部諸羅縣重要港口茅港尾附近一處名為龍船窩的墾權。

我們現在之所以能知道蘇峨曾請墾茅港尾，主要是因其請墾範圍內的一條港道，後來淤積陸化。就從雍正二年(1724)起的 10 年期間，先後至少有 4 人向官府請墾，以期控制該浮復港地的產權：「不意雍正二年有鄭隆彤冒稟□□□□□有鄭江混稟給墾，復有徐之

24 〈嚴禁冒墾義塚碑記(雍正十三年九月)〉，收入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頁 85-86。此碑立於今臺南市下營區茅港里天后宮前民宅溝畔，一般亦推測蘇峨准墾地「茅港尾保龍船窩庄草地」即今茅港里。然該碑實源自官府發至茅港尾張貼的曉諭，這表示張貼的地點(也是後來立碑之處)可能只是因為該處為市廛人集之地，而非墾地。更且，從碑文中明言墾地之四至「東至二鎮庄為界，西至大路界」來判斷，蘇峨准墾之地有可能是位於今官田區南廊里。

25 〈蘇巍庵夫妻合葬墓誌銘〉，收入何丙仲、吳鶴立編纂，《廈門墓誌銘匯粹》(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頁 173-175。

純冒報陞科，悉欲涎貪此地……又有楊周混請給墾」。²⁶這些人應該都不是等閒之輩，因為爭產的手段是請墾與陞科，必須跟官府打交道，其中有兩人甚至已獲得縣官批准。而且我們至少知道鄭隆彤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諸羅縣學歲貢生。²⁷蘇峨在爭墾案發生時已經過世，他的兩個兒子在庄民的促請之下，出面向諸羅縣衙門提出控告，獲得知縣的支持，同意將該地「留為公眾塚牧」。庄民們獲知縣官的裁斷之後，請求發給曉諭，讓他們可以刻石立碑，公開展示，以杜爭端。這方石碑的存在意味著，蘇家至少在獲得墾權後近半個世紀期間，還穩定控制龍船窩庄的產業。他們也願意替庄民出面向官府積極爭取地方公益，即使面對的是地方勢豪與胥吏的產業爭奪，必須耗費一筆可觀的金錢。

蘇峨擁有臺灣學籍和地產並願意出面支援墾區庄民，並不意味著蘇峨曾長期在臺定居。他們夫妻的墓最後是葬在福建同安原鄉，四個兒子雖擁有生員的功名，學籍卻都不是在臺灣；目前也沒有他們家族後代曾在臺定居活動的相關記錄。

蘇峨請墾的茅港尾及其周邊廣大的土地，是明鄭時代最為核心的軍事屯墾區。清初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來臺後不久，隨即協同北路最高軍事指揮官踏查適合興建縣衙的場所，海陸交通均便的茅港尾是四個候選地點之一。季麒光也在他給上級的調查報告中指出茅港尾的特色，「茅港一區向屬營盤」。稍後，季知縣一再向福建省級官員抱怨，以施琅(1621-1696)為首的攻臺武官搶占臺灣田園，被他引以為個案說明的就是今臺南市北部內陸曾文溪與八掌溪之間，亦即「大排竹、下加冬、鐵線橋、茅港尾、急水溪等處，皆係墾熟營盤」。季麒光接著還說，這些地

26 〈嚴禁冒墾義塚碑記(雍正十三年九月)〉，收入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頁 85-86。

27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266。

方當時有「詹高、陳貴等自稱督墾管事，以偽時名號，登堂抗禮，田數多寡，不容查核。差官陳欽、顏親等十有餘人，奉將軍令牌，勒限徵租，擅撥車夫，縣官亦無從詰其真偽，莫可如何」。²⁸看來，茅港尾地方的營盤田似乎沒有受到政權轉換的影響而荒廢，依然持續在種植收成、收租納稅。我們想說的是，蘇峨在康熙二十八年取得墾權的茅港尾保龍船窩庄，很可能不是因為當地在清初處於荒地狀態，再經蘇峨重新招墾。整體上，實際的過程還是比較接近沈紹宏請墾的鹿野草，同樣是諸羅知縣與攻臺武官競爭控制田園的案例，也就是明鄭時期的「營盤田」在清初經由請墾制度後，轉變成為登記在戶部稅收帳冊的「民田」。

清廷攻臺武官將領在政權轉換之際，面對敗降的鄭氏政權，利用攻臺威權，趁清廷內部棄留爭議僵持不下之機，大量圈占明鄭時期由各地駐軍屯墾、未登記在官府稅收冊上的「營盤田」，以及由明鄭文武要員、有力之家墾殖的「文武官田」。戰爭以及政權轉換也同時帶來租佃關係與地權的變化，有不少佃戶因為業主逃亡而向新政府登記田產，成為「民田」業主。這使得明鄭時代的「官田」，轉變成「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的「民業」。清領後，作為帝國基層的臺灣縣級官員，為了順利徵足稅額並對付擁有強大聲望的攻臺武官之搶占行為，迅速在臺推行當時朝廷為求從戰亂中恢復生產與社會秩序的請墾制度。因為這套制度明文規定：想要開墾荒地的百姓，可以向地方官提出申請；地方官在確認土地並未侵占他人田園、確為荒地之後，就可以予以核准。知縣藉此得以掌握轄內荒地的開墾權，並擴張政府稅收帳冊上的「民田」。²⁹

²⁸ 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頁202、210。

²⁹ 關於清初地方官員及攻臺武官爭奪田園的歷史，可參閱李文良，〈民田與請墾制度〉，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頁27-56。

陞科納稅一直是清代臺灣業主主張地權的重要手段，特別是面對官府清查與訴訟的時候。我們注意到了，蘇家在雍正年間(1723-1735)面對地方豪強數次的土地爭奪時，向官府表達他們擁有地權的理由，就是先講他們在何年因請墾而獲准、墾地的四至，然後就是繳稅記錄，亦即：「康熙二十八年年請墾茅港尾保龍船窩庄草地，東至二鎮庄為界，西至大路界，南至劉西舍庄番仔車路□□□□為界。年帶課粟六十八石，廊餉四張，歷掌無異」。³⁰我們可以瞭解，大概也是因為承擔賦稅的是蘇家，所以地方庄民面對土地紛爭時，必須請蘇家跨海來臺，出面與官府周旋。

值得注意的地方還有，蘇家的稅賦負擔除了正供穀之外另有「廊餉四張」，這是清代方志中稱為「蔗車」的傳統製糖工場「糖廊」之稅收項目。依據清初的規定，蔗車每張應稅 5.6 兩，蘇家擁有 4 張，「廊餉」總額應為 22.4 兩。問題是康熙年間諸羅縣的蔗車餉額，除了接收自明鄭時代的「舊額」22 張之外，只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新陞 3 張之記錄。³¹這表示，蘇家在康熙二十八年請墾此地，有可能不是實際從事開墾，而是承擔官府額缺田賦而來(粟 68 石、廊餉 4 張)，至少廊餉 4 張應是被強制攤派。地方官府為了避免欠缺餉額困擾，常趁機攤派；地方豪強以及衙門胥吏也常以承擔缺額餉稅，作為請墾荒地的口實。

30 〈嚴禁冒墾義塚碑記(雍正十三年九月)〉，收入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頁 85-86。

31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179。

三、「里民自實新墾」(康熙三十一年，1692)

所謂的「里民自實」應是指，百姓向官府自首呈報其所擁有之已墾未陞田園，通常發生在官府清查隱匿田園，且讓業主得以自首免去罪罰之時，文獻上有時也寫作「首墾報明」、「首報陞科」或「自首陞科」。很明顯，方志單純的陞科數字背後，有著官府在特定時期施行的政策與土地法令。最著名的案例是雍正三年(1725)起，福建省為了彌補減免鳳山八社熟番婦女稅額，著手清理漢民匿報產業，以增加應稅田園的「首報陞科」地稅改革案。當時，凡願意自首呈報隱匿熟番名下產業的漢民，均得豁免原本應承受之罪罰。³²

關於康熙三十年代初期里民自首田園，方志之記載內容稍有差異。乾隆《重修臺灣縣志》是：「三十二年，里民自實二十九、三十兩年新墾田園」。康熙《臺灣縣志》則為：「康熙三十一年，新墾田園共一百九十甲一分三釐三毫七絲九忽……又，奉文各里自首報新墾田園，共三百零三甲三分四釐一毫零二微」。³³大約同一時期編修的《諸羅縣志》也記載：「康熙三十一年……又，本年奉旨通行各里自首新墾園五百二十五甲五分九釐六毫八絲」；³⁴《鳳山縣志》的記載則為：「[康熙]三十二年，奉文令里民自首二十九年、三十兩年新墾田園共二百五十甲三分三釐二毫四絲」。³⁵

32 即所謂雍正地稅改革案，可參閱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106-117。

33 王禮主修，《臺灣縣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4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243-244。

34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170。

35 李丕煜主修，《鳳山縣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5冊，臺北：

表面上，方志登錄里民自實的年代，似因縣別、版本不同而有康熙三十一、三十二年兩種說法。然而，若仔細閱讀文本可以發現，陞科數據登載在康熙三十一年者，都會特別添加「奉文」或「奉旨」字樣。據此，里民自首之政策的實際過程，比較合理的推斷應是：官府在康熙三十一年時推行清查政策，而其調查則區分土地究係二十九或三十年(1691)墾熟，然後此類「里民自實田園」全部從康熙三十二年起科，繳納田賦。正因為如此，有些稍晚完成的府級方志，就直接將其彙整改為「康熙三十一年……又奉文令各里自實新墾田園，應於三十二年起科」。³⁶有意思的是，不同府縣、版本之方志的記錄差異，卻是我們復原實際政策過程的主要線索。康熙三十一年推動的自首政策相信是特例，因朝廷的法規是：「凡募墾、報墾、勸墾田園，俱於次年起科；惟里民自實者，遵照部文即於自實之年起科」。³⁷

里民自首看來相當踴躍，三個縣當年度登錄的該類田園總數即有1,079 餘甲，高於以往每年平均新墾的 770 甲，約佔清領以來新墾田園總額的 16%。稍微對清代歷史有認識的人應該都很難相信，僅憑官府一紙命令，偏遠的邊區社會就能如此守法，踴躍向官府自首，報陞他們隱匿的田園。想來，這次的清查應該有些額外的經濟誘因，例如讓自實田園適用優惠稅率，就像前引雍正年間的地稅改革一樣，只有先前稅率的三分之一，業主因此勇於申報；或者是表面名為自首，其實背後有著地方官府的強力動員與清查作為。然而，因為現存方志等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 134。

³⁶ 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 2 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4)，頁 253。

³⁷ 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頁 191。過程也有可能是：地方的清查起於康熙二十九年，法規上到朝廷討論批准則是三十一年，因此規定於翌年起科。

文獻並沒有記錄田賦稅率在康熙三十年代曾有所調整，當時土地業主踴躍自首的主要原因應該是後者。

我們注意到了，康熙三十一年就任臺灣道的高拱乾，在其任內(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692-1695]十一月在任)曾發布著名的〈禁飭插蔗并力種田示〉，目的是為了抑制百姓競相栽植甘蔗的現狀，「舊歲種蔗，已三倍於往昔，今歲種蔗，竟十倍於舊年」。作為臺灣最高行政長官的高拱乾，對社會逐利忘本的傾向頗感憂心，因為臺灣遠在海外，一旦米價騰貴，將使社會陷入難以收拾的混亂局面，有違清初治臺政策的初衷。為此，高拱乾除了從供需原理、稅收政策以及社會治安等方面，呼籲百姓改植稻米、不要插蔗外，還進一步命令各知縣就蔗園「按畝清查，通報起科」，希望可以藉此抑制農民栽植甘蔗的熱潮。³⁸

看來，康熙三十一年里的民自實及其業績，極有可能來自新任臺灣道高拱乾的雷厲風行。雖然如此，清查活動也不是臺灣地方官員自己戮力執行，就能獲致最終成果。因為清查之後的陞科以及「自首免罪」，都必須經過福建及北京朝廷的批准。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因素，有些方志將陞科原因寫作「奉旨」(而不是「奉文」)，讓人以為政策來自於北京朝廷的親自指示。

反映這一波植蔗熱潮以及官府清查作為的，還有臺灣的三個縣都在康熙三十二年，出現了康熙年間唯一的新陞「蔗車」記錄。所謂「蔗車」是將甘蔗原料加工再製為糖的工場(「糖廊」)，通常設置在種植甘蔗的鄉村中，以利原料採集和運輸。蔗車數量的增加因此也能反映甘蔗栽植範圍的擴張。根據臺灣方志的記載，康熙三十二年新陞蔗車分別是：臺灣縣 1 張、鳳山縣 20 張、諸羅縣 3 張，總共 24

³⁸ 《臺灣府志》收錄的〈禁飭插蔗并力種田示〉並未標明發布的日期，但本文推測有可能是康熙三十一年。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頁 412-413。

張、徵銀 134.4 兩。儘管數量不多，但在此之前臺灣府蔗車稅額也才 75 張、420 兩。換言之，光是康熙三十二年度的新陞，就讓臺灣府的蔗車稅額一舉增加 32%。³⁹更且，「蔗車」常被方志歸類為「雜稅」，而清代臺灣種類繁眾多的雜稅中，康熙年間唯獨「蔗車」一項有新陞記錄。康熙三十一年臺灣官府推動蔗園清查的威力可見一斑。這同時意味著，當時的官員確實曾特別針對蔗園及其加工產業進行清查整理。

四、地方拓墾與行政

值得注意的地方還有，康熙三十一年全臺新陞蔗車稅額，竟有高達 83%來自於南臺灣的鳳山縣。肯定也不會是單純的巧合，位於今高屏溪以南的屏東平原(也是清代最主要的蔗糖產地之一)，目前文獻所見最早就是在臺灣道高拱乾主導編修的《臺灣府志》，被記錄已經編入警政與賦稅系統，分設淡水港東、港西兩個「里」、各編為 18 甲。⁴⁰雖然，我們目前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確認，屏東平原納編警政與稅收系統是在康熙三十一年，但應該就是在高拱乾臺灣道任內無疑。臺灣歷史地理學者施添福很早就注意到，高拱乾編修的《臺灣府志》在篇首添附的地圖中，首度出現平原唯一的漢莊「萬丹民社」；他也推測，閩籍移民「大致在康熙三十年左右入墾屏東平原，大部分聚居於萬丹、新園附近」。⁴¹事實上，「萬丹」不只是下淡水閩籍漢民最初的重要根

³⁹ 蔗車稅率為每張徵銀 5.6 兩；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頁 266-267；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179。

⁴⁰ 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76、492。

⁴¹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入詹素娟、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

據地，同時也是粵民追溯祖先移住臺灣時曾短暫共同居住過的地點。⁴²更有意思的是，作為清代下淡水粵民凝聚及動員中心的忠義亭，供奉最早的一座官員長生祿位，就是臺灣道高拱乾。⁴³這意味著，屏東平原的閩粵住民都將他們在臺定居的歷史，追溯至高拱乾任內。屏東平原可能在高拱乾任內納編警政與賦稅系統一事也警示我們，當時臺灣各地面對官府頗為積極的勘丈陞科行動，有著不同的考量和回應。有些地方可能跟下淡水一樣，趁著參與官府清查田土的展開，尋求納編地方行政管理，藉以合法化其在現地的移墾定居。

官府登記應稅田園的急速增加，看來也不單純只反映官府徹底清查的決心，有一大部分還是臺灣的拓墾與社會，自領臺以來已經有了大幅度的進展。⁴⁴我們可以瞭解，水田雖然可以直接改種甘蔗，但蔗園若無完善的水利設施支撐，卻無法直接轉種水稻，滿足高拱乾的期待。這表示，當時臺灣蔗田大幅擴張，不見得單純只是農民見到甘蔗有利可圖，也有可能是臺灣進入了新的一波墾荒熱潮。稻米因為官府嚴禁輸出海外以致價格低廉、無利可圖，雖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我們

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68。

42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增訂版)，頁 36-48。

43 林竹貞，〈六堆忠義祠與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之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67。

44 清初臺灣蔗田大幅擴張，或許跟清領後前 40 年間臺、日之間仍然存在的貿易活動中的臺糖輸出有關。參閱朱德蘭，〈清康熙雍正年間臺灣船航日貿易之研究〉，收入金祥卿主編，《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6)，頁 421-451；朱德蘭，〈清康熙年間臺灣長崎貿易與國內商品流通關係〉，《東海學報》，29(臺中，1988)，頁 129-148；鄭瑞明，〈清領初期的臺日貿易關係(1684-1722)〉，《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4)，頁 43-87。此一看法及其相關研究，承蒙審查人指出，特此致謝。

也不要忘了，造成蔗園單方面大幅擴展的理由可能還有，康熙二十年代晚期臺灣整體的水利工程，受限於資金與技術，還沒有相應的發展與擴張，致使當時比較積極開發的是以適合種植甘蔗的旱田為主。畢竟目前文獻所能看到的大型水利設施，大都是在康熙五十年代以後的事情。⁴⁵

高拱乾發布的〈禁飭插蔗并力種田示〉反映了康熙二十年代晚期，臺灣曾歷經了一波的土地開發熱潮。當時整體的環境，已經不同於領臺初期官員面對人去業荒、荊棘叢生，必須高聲疾呼積極引入華南的資金與人員。這也是清初較為主動的「募墾」政策之結束，轉為一般「報墾」的原因所在。換言之，所謂報墾是一般的請墾制度，不像「募墾」或「勸墾」，帶有官府主動招徠或獎勵的面向。

五、「報墾」：康熙三十年代的新展開

臺灣道高拱乾在其任內推動的田園清查及其展現的顯著業績，標示臺灣社會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地方持續著請墾熱潮，地方豪強甚至是衙門胥吏為了競逐土地資源，皆力爭成為墾戶，盛況空前。地方官府現在要擔心的，不是有力之家不願意投入資金，或者是百姓無意渡海來臺，而是有力之家競相請墾，敗壞社會秩序。清初的「募墾」政策在康熙三十二年停止，轉而改為一般的「報墾」，應與此一環境背景的變化有關。⁴⁶誠如表 1 所示，臺灣縣的「報墾」記錄從康熙

⁴⁵ 黃富三，《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頁 68-72；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頁 77-99。

⁴⁶ 值得注意的還有，影響熟番賦稅的「新附生番」之辦法，最早就是在康熙三十二年出現。諸羅縣康熙年間的「新附生番」共有康熙三十二、三十四、五十四年三次。其中，康熙三十四年大雞隆通事賴科招撫後山崇爻 9 社附

三十二年開始至四十年(1701)，以及四十五(1706)、四十六(1707)兩年都將新墾田園明載為「報墾」，有別於前後的「募墾」和「勸墾」。(表 1)⁴⁷

臺灣地方有力之家競相爭取墾戶身分以為土地控制，現存最早的可靠記錄來自於今臺南市麻豆區北極殿，保留的一座乾隆二十年(1755)的大型石碑。碑文內容講述地方民番通力合作，在官府的訴訟中擊敗鄰近陳姓豪族占奪里內港道的經過，同時也回溯先前康熙年間他們就曾數度發動訴訟，以維護港道不為他人請墾成為私產的歷史過往：

緣里內港道一條，水流出口之區。惟流通暢達，故田園廬墓免淹沒之患。詎康熙四十年港戶鄭□□□□縣主毛[鳳綸]於港口築塹，經業戶徐種桂並管、保人等呈毀在案。五十年又有本府四班頭赴前縣主劉[作楫]請築，五十四年更有鹽商施鴻基赴前縣主周[鍾瑄]請築，均蒙批示概不准築在案。五十八年，地棍施甫串蠹洪□□□□□□□□□，恃強填築，民番魚鱉、五穀淹沒。⁴⁸

碑文的記錄顯示，最晚從康熙四十年開始的 18 年期間，就至少發生了 4 次豪強試圖向官府請墾的產業爭奪，出面爭產者包括「港戶」、「業戶」、「本府四班頭」以及「鹽商」，明顯都是地方豪強、有力之家或衙門胥吏，屢敗屢請、前仆後繼，根本不用官府主動費心招徠。

於阿里山社翰餉，亦源自於「康熙三十二年，有陳文、林侃等商船，遭風飄至其處，住居經年，略知番語，始能悉其港道」。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107、175、177-178；藍鼎元，《東征集》，頁 90-91。

⁴⁷ 康熙《鳳山縣志》雖然大致上是以「新墾」來記錄清領之後的新墾田園，卻特別將康熙三十二至三十六等(1693-1697)五個年度稱為「報墾」。這是否意味著，各縣施行「報墾」的年限有所差異？尚待日後進一步評估。李丕煜主修，《鳳山縣志》，頁 136-139。

⁴⁸ 〈嚴禁佔築埤頭港暨盜墾荒埔碑記(乾隆二十年六月)〉，收入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頁 120-121。

清初類似麻豆的爭墾案例還有，前述開臺舉人蘇峨在康熙二十八年請墾的茅港尾。雖然兩案同為墾區內原有水域的爭奪，但麻豆是既有水域圍築魚塢，茅港尾則是陸化浮復地的爭墾。從雍正二年起的短短 10 年期間，至少有 4 人先後向官府請墾，以期控制該浮復港地的產權：「不意雍正二年有鄭隆彤冒稟□□□□□有鄭江混稟給墾，復有徐之純冒報陞科，悉欲涎貪此地……又有楊周混請給墾」。⁴⁹雖然我們現在只知道鄭隆彤是康熙五十四年諸羅縣學歲貢生，⁵⁰但相信這些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因為爭產的手段都是經過官府的請墾與陞科手續，必須跟官府往來，除了上下打點，也應熟悉衙門運作。

上述麻豆、茅港尾兩件爭墾案，都是濱海的魚塢及浮復地，並非一般內陸平原。或許有人會質疑，僅憑此二「特例」，難以佐證官府因請墾競爭激烈而從「募墾」轉為「報墾」。由於現存康熙年間的請墾文獻還很稀少，短期內應該不容易找到更多的案例。(表 2)但面對該兩案是否為「特例」的質疑，我們不妨反過來推想：康熙三十一至四十六年間的臺灣，若連屬於濱海、相對較為貧瘠的浮復地，都爭搶成這個樣子，那更適於農耕的內陸平原就更不用說了。

此外，麻豆及茅港尾的爭墾案例也可以說明：從康熙年間開始，經由官府的請墾制度、陞科納稅，就一直是臺灣控制土地產權，最為重要的手段；地方有力之家以及衙門胥吏彼此之間，也都非常明白請墾制度及其效力。由於類似的爭墾案例在清代時有所聞，有不少高級官員也大聲批評，某些人僅憑一紙請准開墾的公文，就控制了廣大的荒地，建議應給百姓小額土地，以維護社會公平。雖然如此，一整個清代卻都沒有落實。

49 〈嚴禁冒墾義塚碑記(雍正十三年九月)〉，收入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頁 85-86。

50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266。

表 2 康熙二十三至四十六年間(1684-1707)墾墾記錄

序	年代	墾戶	墾地	座落
1	康熙二十四年	沈紹宏	草地	諸羅縣鹿野草
2	康熙二十八年	蘇峨	草地	諸羅縣茅港尾保龍船窩庄
3	康熙二十九年	——	草地	諸羅縣他里霧保菓麻庄
4	康熙二十九年	黃元	——	諸羅縣打廉庄
5	康熙三十二年	張茂	草地	諸羅縣港頭仔港
6	康熙三十三年	——	草地	諸羅縣西螺仔腳連茄冬腳
7	康熙三十四年	辛承賢等	溪坪	諸羅縣蚊港北中桁
8	康熙三十七年	張振基	荒埔	鳳山縣赤山林內
9	康熙三十九年	吳田業	荒埔	鳳山縣觀音山里大路邊土庫後
10	康熙四十三年	蔡俊	荒埔	鳳山縣淡水港西里濫濫搭樓茅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4)，上卷，頁 7、23-24；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碑碣圖誌》，頁 85-86、87-88。盧嘉興，〈八掌溪與青峰關〉，《臺灣研究彙集》，22(臺南，1982)，頁 111、125；戴炎輝，〈清代臺灣之大小租業〉，《臺北文獻》，4(臺北，1963)，頁 8；〈他里霧堡舊慣調查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414002；〈大租ニ關スル舊記書類(阿猴廳)〉，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415026；〈大租ニ關スル舊記書類(鳳山廳)〉，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422038。

說明：本表僅收錄現有文獻可據者。

清初地方官員推行「募墾」的表面理由，雖然在於地方人去業荒，墾民裹足不前，似乎無人願意來臺請墾。⁵¹實際上，土地爭奪與控制早自清軍入臺伊始，即已激烈展開，從來沒有一天停止。清初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就曾明白抱怨軍方與衙役爭奪田園，案積如山，應接不暇。⁵²差別應該在於，清領最初的幾年，因為政權轉換帶來地權與社會混亂，大家優先爭奪的還是有人耕作可以產出的現成田園，或是輕微荒廢、不用耗費太多資本就可以復耕的短暫拋荒地。畢竟墾戶若要面對斧斤未入的原始林野，肯定得耗費龐大的資金與人力，所需資力及風險相對較高。

除此之外，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募墾」最重要的意涵可能不在於當時無人願意來臺投資開墾，而是地方官員可以將開墾大權給予他喜歡的特定個人，就像沈紹宏經由請墾手續獲得鹿野草荒埔一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募墾」政策的停止，也有可能是來自省級官府或朝廷的制止，不讓地方官員可以自行挑選決定取得墾照之人。

六、「勸墾」(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四年，1702-1715)

「勸墾」政策，誠如其字意所示，應是官府明文鼓勵開墾。從《重修臺灣縣志》的記錄看來，康熙四十一年(1702)開始有「勸墾」田園的陞科記錄。但可能只是短暫施行，因為四十五、四十六兩年又改回「報墾」，中間還夾雜著四十二(1703)到四十四(1705)等三個年度因缺乏陞科

⁵¹ 清初地方官員建議積極招民拓墾四川，講的也是同樣的理由。劉正剛，〈清前期四川和臺灣移民政策之比較〉，頁 87。

⁵² 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頁 201-202、231。

記錄而無法判讀政策走向的時期。據此，假使不是記錄錯誤的話，「勸墾」政策最早可能是在康熙四十一年出現。但最短 1 年，最長則為 4 年，隨即停止。隨後，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又再行恢復，四十八(1709)及五十一年(1712)都有「勸墾」。

關於勸墾政策，最明確的證據來自於代理諸羅知縣宋永清，在康熙四十八年發給陳賴章准其請墾臺北大佳臘荒埔的告示：

臺灣府鳳山縣正堂紀錄八次署諸羅縣事宋，為懇給單示，以便墾荒裕課事。

據陳賴章稟稱：「竊照臺灣荒地，現奉憲行勸墾。章[陳賴章]查，上淡水大佳臘地方有荒埔一所，東至雷厘、秀朗，西至八里分干廍外，南至興直山腳內，北至大浪泵溝，四至並無妨礙民番地界，現在招佃開墾，合情稟叩金批准給單示，以便報墾陞科。」等情。業經批：「准行，著該社社商、通事、土官查勘確覆。」去後。茲據社商楊永祚，夥長許總、林周，土官尾帙斗謹等覆稱：「祚等遵依會同夥長、土官，踏勘陳賴章所請四至內高下不等，約開有田園五十餘甲，並無妨礙，合就據實具覆。」。各等情。到縣。據此，合給單、示付墾。

為此，示給墾戶陳賴章即便招佃前往上淡水大佳臘地方，照四至內開荒墾耕，報課陞科，不許社棍閑雜人等騷擾混爭；如有此等故違，許該墾戶指名具稟赴縣，以憑拿究。該墾戶務須力行募佃開墾，毋得開多報少，致干未便，各宜凜遵，毋忽，特示。康熙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發淡水社大佳臘地方張掛。⁵³

⁵³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第 1 卷上，頁 186。

陳賴章等人在給諸羅知縣的請墾稟文中明確提及：「竊照臺灣荒地，現奉憲行勸墾」，使用的正是「勸墾」一詞。看來，應該是有官府明文鼓勵開墾，而且這個指示曾經下達臺灣社會，以致於陳賴章得以依據現行政策提出申請。

我們現在常以為，臺北平原最初的開發始於康熙四十八年陳賴章的請墾。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因為諸羅知縣核發的告示中也明白提及：經由在地番社頭人實地踏查之後，確知：「陳賴章所請四至內高下不等，約開有田園五十餘甲」。其面積約為位於今臺北市大安區的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的一半大小；顯然當地已經有了大量的田園，並不全是荒埔。儘管我們現在不知道，這五十餘甲的田園是屬於熟番還是漢人開墾。但這無疑清楚表示，臺北平原的拓墾活動應早於官府的請墾記錄。

如果是這樣的話，康熙四十八年大佳臘告示的核心歷史意涵，就不在於反映臺北平原在該年開始啟動墾荒，而是籌組「陳賴章」墾號的那群人，為何特別挑選康熙四十八年而不是其它時間提出申請，亦即官府在康熙四十八年左右的政策動向。誠如現行研究已經講明，「陳賴章」並非實存之人的姓名，而是多人合組的公號。他們除了以「陳賴章」之名請准大佳臘外，同時還以「陳國起」及「戴天樞」之名，申請了淡水港南以及麻少翁社東勢荒埔。這三塊埔地彼此毗連且同時迅速獲得知縣的批准。我們想說的是，康熙四十七年重新復活的「勸墾」政策，即使沒有對申請者或其墾熟土地稅率採取優惠，至少請墾案能快速獲得知縣的批准，即使土地事實上屬於熟番，官民彼此都樂意「朦朧給照」。⁵⁴

⁵⁴ 關於「朦朧給照」的討論，可參閱柯志明，《番頭家》，頁 86-104。官員樂意朦朧給照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道理：「漢人墾番地為田者，計值代番輸餉，於賦既增，於番亦甚便也」。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189。

陳國棟曾就臺北早期的開發提出一套極具創見的看法，他認為：康熙四十年代晚期活躍於閩浙沿海的海盜鄭盡心，引起朝廷與省府的高度注意。臺灣地方當局基於職責以及上級指示，為了防備鄭盡心潛蹤於北臺灣，遂展開駐軍設防、官員巡視以及移民拓墾等一連串積極政策。陳賴章之所以能在康熙四十八年從諸羅知縣手中獲准臺北平原的開發，與此一大環境背景的變化有關。陳國棟也進一步引用《臺海使槎錄》的說法以為佐證：「自海盜鄭盡心脫逃，部文行知：夥盜供稱鄭盡心約在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台州之魚山、福建臺灣之澹水等處藏匿；維時總兵崔相國分撥千總一員領兵分防澹水。自後遂以為常，而業戶開墾，往來漸眾」。⁵⁵康熙四十九年(1710)剛就任臺廈道的陳璘(1656-1718)更是為此親身來到臺北巡視，隨後也向福建巡撫建議積極招徠墾民拓墾荒田，以期「民無失業，地無遺利」。⁵⁶

代理諸羅知縣宋永清在康熙四十八年大方批准臺北平原墾權時的正式身分是「鳳山縣正堂」，也負責南臺灣的請墾事務。現存一份非常特別的墾照是，鳳山知縣宋永清同樣在康熙四十八年七月發給墾戶張振基，准其開墾「赤山林內荒埔」。但擁有生員身分的張振基呈給宋知縣的稟文卻是宣稱：他早在十年前的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二十二日，即向姓盧的代理知縣「請墾」，且經調查「四至與官民青熟

⁵⁵ 陳國棟，〈臺北與海洋——現實生活與集體記憶〉，《臺北文獻(直字)》，156(臺北，2006)，頁 1-19；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32。清廷因應海盜鄭盡心的軍備調整，包括佳里興分防千總移駐淡水，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188、194。

⁵⁶ 陳國棟，〈臺北與海洋〉，頁 10；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41-142；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0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 62-63；陳璘，《陳清端公文選》(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3。

田地遠隔無礙，蒙批准墾在案」。頗令人好奇的是，張振基完全沒有解釋究竟是舊墾照遺失或未及開墾，以致於十年後又來申請墾照？宋知縣看來也沒有詢問，他一接到張振基的稟文，即「據此，合就給墾……聽其募佃開墾」。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才來到年中的七月分，宋永清發出的墾照就已是「鳳字第二十五號」。⁵⁷這表示，康熙四十八年，光是鳳山縣就大約發出了 50 張的墾照。假使我們再將宋永清同時准墾臺北平原的大方作為考慮進來，那麼這無疑是一個墾照隨意大放送的時代。

整體看來，臺灣從康熙四十一年起至五十四年夏天為止，進入了新一波地方官府積極獎勵拓墾開發的時期。跟康熙二十年代晚期開始以旱田、蔗園為主的開發不同，這一波的新開發潮是以水田稻作為主，配合著大型水利工程的興築，也就是研究者已指出的康熙四十、五十年代臺灣的水田化運動。⁵⁸毫無疑問，這不只是臺灣農田作物、水利技術、拓墾活動，也是商業貿易、族群關係以及社會結構，急遽轉變的新時代。官府大肆發放墾照，誘引大規模的移民和投資風潮，雖然促進了商貿活動與經濟發展，卻也促發社會秩序波動、加深漢番之間的利益衝突，導致了康熙五十年代中期請墾制度的重大變革。

57 〈大租二關スル舊記書類(鳳山廳)〉，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422038。該墾照中提及的「署縣主盧」，有可能是臺灣知縣盧承德(康熙三十六至三十九年[1697-1700]在任)。因為鳳山知縣朱繡在三十六年二月即以丁憂離職，而下一任的劉國輔卻要到三十八年(1699)才上任。

58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頁 84-89。

七、「勸墾」遽停及其影響

由於臺灣縣在康熙五十二(1713)年至雍正五年間沒有田園陞科，因此無法直接從《重修臺灣縣志》的記載，來確認「勸墾」政策結束的時間點。雖然如此，有兩條間接史料可以判斷，「勸墾」政策應該在康熙五十四年夏天正式廢止。⁵⁹

首先，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就任福建巡撫剛滿三年的滿保(1673-1725)向皇帝報告臺灣雨水糧價時順道提及，他鑑於諸羅縣地廣人稀、地土肥沃，已命令新任諸羅知縣周鍾瑄盡力招佃開墾。⁶⁰從滿保不是請示皇帝可否施行，而是直接報告他執行招墾政策看來，滿保應處於官府鼓勵臺灣開發的政策之中。⁶¹所以滿保在報告中也提及，開墾不只有益地方民生，更能增加國家的錢糧稅收。原本期待皇帝讚

⁵⁹ 以下兩段有關康熙五十四年勸墾政策的轉變，引自筆者 2011 年發表的舊作《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2019 年發行增訂版)。然而，舊作完全沒有觸及康熙年間的「請墾制度」有募墾、報墾及勸墾的差別，及其所對應的官府政策及本地的社會經濟變化。本文更為主要的發現是，將康熙五十四至五十五年岸裡社的歸化，置於請墾制度的轉折點來觀察，說明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產生的歷史背景及意義。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頁 89-92。

⁶⁰ 王小虹等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992。

⁶¹ 〈福建巡撫張伯行為奏報年歲收成並地方情形事(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9 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4)，頁 208；張伯行，《正誼堂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據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影印)，卷 5，頁 8-9；陳瓚，《陳清端公文選》，頁 13。

賞他在邊疆致力執行勸墾政策的滿保，卻在隔年二月接到皇帝幾近駁斥的批示。康熙皇帝認為，為了錢糧稅收而廣招移民、普行開墾，是一種短視近利、遺禍未來的做法。雖然皇帝最後講得還算委婉，希望滿保再和總督斟酌會商後才決定是否續行勸墾。但因皇帝反對廣招佃民開墾的意向實已表露無遺，滿保在四月分回覆皇帝的奏摺便說，不只他拜讀硃批之後，深感皇上「博聞遠慮」，使「至愚極陋」的他「頓開茅塞」，連閩浙總督范時崇(1663-1720)恭讀他轉抄的聖旨後也有相同的感受。他們決定「臺灣墾田之事即行停止，唯查明臺灣當地人，嚴巡三縣各關口，制止私渡」，並且已將新的政策意旨當面告知新任臺灣道梁文科(康熙五十四至五十六年在任)。⁶²據此，康熙四十一年左右重新展開的獎勵墾荒政策，應在康熙五十四年夏天有了急遽的轉變，而且不只開墾政策緊縮，連移民渡臺也連帶受到影響。由於福建巡撫滿保在當年十一月隨即被擢陞為閩浙總督，直到雍正三年十月去世為止。我們也可以推測，緊縮開墾與移民渡臺政策應該會被持續落實，直到雍正初年。⁶³

臺灣移民墾荒政策的轉變，也可以從康熙年間在臺久任的官員陳璘身上看見。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剛調升福建巡撫的陳璘奉旨進京陛見。陳璘在回答康熙皇帝有關「臺灣荒地是如何」的問題時，做了以下的陳述：

臺灣原無荒地；南北路荒地雖多，俱是土番鹿場。他們納餉、

62 〈福建巡撫滿保奏報停止在臺灣招人墾地摺(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三日)〉，收入王小虹等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000-1001。

63 值得注意的是，皇帝為何在康熙五十四年時主動表達對於臺灣開墾及番地政策的意見？此事應有清廷其他要員發言，以及海盜、南洋貿易等更大政策脈絡。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頁46-49。

養家，俱於是出。若將此荒地墾了，便沒了鹿場、便失了生業。所以撫臣久經出示嚴禁，不許土棍人等往南北路藉名開墾、擾害土番，方得相安無事。⁶⁴

陳璘謁見皇帝時陳述他採行嚴格認定臺灣荒地的發言，明顯與他五年前剛就任臺廈道時，建請閩撫積極招徠閩南移民、開墾荒地並放寬渡臺禁令的做法，有著令人難以理解的落差。⁶⁵然而，假使我們考慮康熙五十四年皇帝直接表明反對臺灣開發政策的態度，就不難理解陳璘的立場為何前後判若兩人。從陳璘回覆皇帝時曾提及「撫臣久經出示嚴禁」一語看來，省級官府已經一再向臺灣官員宣示，要落實緊縮移民墾荒的新政策。陳璘肯定早已從總督滿保那裡聽到了消息與教訓，事先對即將到來的皇帝面試，做足了準備。果不其然，康熙皇帝十分滿意陳璘的回答，沒有繼續再進一步追問。我們現在之所能如此貼近陳璘的心情，主要是因為陳璘後來曾將他仰瞻天顏的對話，極為詳細地記錄下來，他特別提及皇帝對他「臺灣荒地是如何」之回答的反應是「上點首」。⁶⁶閱讀這段記載總令人感覺，康熙皇帝特別向陳璘提起臺灣荒地話題，是在確認他四月時給滿保的政策指示，是否有被遵守落實。當我們現在重新回過頭來觀察，康熙五十四年夏天臺灣開發政策的急遽轉變時，重點應該不在於陳璘，而是康熙皇帝本人的立場轉變。可惜因史料缺乏，我們大

⁶⁴ 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頁 79-80。

⁶⁵ 陳璘，《陳清端公文選》，頁 13-17。柯志明早就注意，剛就任臺廈道的陳璘雖主張開發，卻同時有嚴格認定番地、禁漢民墾番地的建議。柯志明，《番頭家》，頁 81。值得注意的是，陳璘禁墾番地之議出自〈條陳經理海疆北路事宜〉，「招墾荒地」之議則是應對閩撫張伯行(1651-1725)之諮詢而發的〈臺廈條陳利弊四事〉。前者六條均環繞在如何「綏輯土番，固我心腹」；張伯行則是積極開發論者。

⁶⁶ 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頁 80。

概只能猜，應是有其他官員向康熙皇帝奏陳，臺灣因為開發而來的族群衝突與社會糾紛，讓皇帝有了警惕，決定緊縮臺灣的開發移民政策。⁶⁷

康熙五十四年夏天經由皇帝親自指示而被落實到福建省府以及臺灣現地的開墾移民緊縮政策，無疑將對臺灣未來的社會發展產生影響。我們很簡單就可以猜想，已經處於熱潮之中的臺灣移民與拓墾，不可能因為命令直接來自於朝廷就戛然而止；特別是福建各級地方官員還是主張開發的那些人在主政。比較可能的發展大概是：自清領以來已執行近三十年的請墾政策，現在必須適度調整以同時符合皇帝期待與社會現狀。

我們必須瞭解，請墾政策的法律源頭，來自明清易代之際內地各省普遍的土地荒廢，朝廷鼓勵百姓將荒地墾復，穩定生產與社會秩序。因此之故，請墾制度明確的對象是「荒地」。問題是，傳統中國政府的田土登記通常只是應稅田園，並沒有一套「荒地」帳冊。所謂「荒地」就只能從扣除法而得，以臺灣的情況來說，所謂的「荒地」就是非「民地」或「番地」。康熙年間臺灣地方官府核准百姓墾荒之關鍵，就在於確認申請標的的「荒地」，是否「無礙民番」。從現存為數不多的康熙年間墾照與告示可知，官府確認荒地的具體辦法是請在地熟番或漢民頭人，出面勘查、具保切結。然而，康熙五十四年陳瓚回答皇帝臺灣荒地的質詢，無異於讓臺灣「荒地」完全等同於「熟番地權」。

⁶⁷ 從康熙四十九年海盜鄭盡心事件開始，官員們環繞在北臺灣的開發與佈防，有過激烈的辯論。雖然如此，觀察者卻大致同意以下的現象：康熙四十年代後半期以來，北路流民日漸增多，帶給番社壓力，將引發動亂，「流移日多……巧借色目以墾番之地、虛番之居、妻番之婦、收番之子……相仇無已，勢必構禍」。(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188-189)康熙四十年代後半期以來北路急增的流民與移墾風潮，顯然和官府採行「勸墾」政策有關。

想來，清初以來建構在「無主荒地」前提下的請墾制度，恐怕是難以繼續施行，因為「墾荒」現在就等於「開墾番地」。解決此一難題的有效方法應該是，制度上的墾荒主角須從漢民轉變為熟番，同時凸顯熟番地權。從上述的歷史背景出發，我們現在可以重新來評估康熙五十五年(1716)臺灣南北兩路「生番歸化」事件，特別是資料相對豐富的岸裡社。

八、「生番歸化」(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三年，1715-1725)

諸羅縣岸裡五社生番的正式歸化行動，應該始於康熙五十四年。岸裡社長期保有的最早一份官方文件，就是諸羅知縣周鍾瑄在當年十一月一日，因「岸裡、阿里史等社，不憚遠趨，傾心向順，仰遵教化」，而發給其頭人阿莫的信牌，委任他為「土官」，總理各社事務；⁶⁸周鍾瑄主修的《諸羅縣志》也將岸裡五社的歸化記錄為康熙五十四年。⁶⁹隨後才在康熙五十五年，由總督滿保、閩撫陳璘以及水師提督施世驄(1667-1721)共同署名，向康熙皇帝〈題報生番歸化疏〉，讓「南路生番等十社」、「北路生番岸裏等五社」，「同熟番一體內附」；這份著名題本最早的版本同樣是出自於康熙《諸羅縣志》。⁷⁰臺灣生番歸化的風潮，突然起於康熙五十四年夏天朝廷停止移民招墾、禁墾番地之後，似乎並非單純的偶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原本已經安排好的墾荒事業，因為朝廷突發的政策轉變而不得不加以

68 〈乾隆五十一年國子監給發潘士興捐納貢生監照〉，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岸裡大社文書》，編號：AH2384。

69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107、178。《諸羅縣志》在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始修，五十六年二月脫稿、四月梓版。

70 〈題報生番歸化疏(康熙五十五年)〉，收入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320-322。

因應調整的結果。畢竟負責籌劃生番歸化的福建地方官員就是總督覺羅滿保、巡撫陳瓚以及諸羅知縣周鍾瑄等人。⁷¹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九日，諸羅知縣周鍾瑄發給岸裡社一份曉諭，同時也是岸裡社後來長期保有的第二份官發文件。儘管內容高度展示著帝國文化主義的理想，但重點卻在於剛完成歸化手續的岸裡五社，取得了大甲溪以南廣大土地的開墾權：

諸羅縣正堂加一級紀錄四次周，為食宿無地，籲天垂憐，恩賞片土，以甦番命事。據岸裏五社土番阿穆、大眉、帶煙、居乃等，具稟前事詞稱：切穆等原屬化外，耳目皆無見聞，茹泉食果，不異飛禽走獸。幸逢老爺德澤廣被，招徠撫綏，設通事傳譯，教導飲食起居，習尚禮義倫理。穆等深沐化成，傾心照例輸餉，是前為化外異類，今則為聖世王民矣。然禮義倫理雖未盡識，而飲食起居實所諳曉，獨是原居深山窮谷，衣食無資，雖為歸化之民，弗得土地，而起居寢食終屬不安。因查山外有一帶曠平草地，東至大山，西至沙轆地界大山，南至姑婆，北至大溪，東南至阿理史，西南至棟加頭地。此地民番並無妨礙，不日野番時常出沒之所，漢人皆不敢到。穆等思欲到處開墾耕種，上得輸餉，下資口食，並阻野出入。但未蒙仁憲賞賜，不敢擅自開闢。理合稟請天恩，批賞穆等五社番黎前去耕墾飲食起居，則頂戴鴻慈而不朽矣。等因。前來。據此，除將校標林、大姑婆等處曠平草地，准穆等前去開闢外，合就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沙轆、大肚等社通事人等知悉，即便遵照。茲得以阿穆等五社土番雖愚不諳，莫為佔踞，抽取租稅。阿穆等亦宜

⁷¹ 岸裡社歸化及其負責官員，可參閱柯志明，〈岸裡社的私有化與階層化——賦役負擔與平埔族地域社會內部政經體制的形成和轉變〉，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頁 86-87。

遵照制限管耕，不得越界開墾，以滋爭端，干譴未便。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給。

發岸裏社張掛曉諭。⁷²

值得注意的是，岸裡五社取得大甲溪南墾權的理由，不是日後一般常見、宣稱該地為其祖遺之地，而是形式上先由岸裡五社主動稟報縣官，「山外有一帶曠平草地……無礙民番」，再由知縣准許他們前往墾闢。基本上就跟清領以來的墾荒模式及請墾制度程序一樣。康熙五十五年諸羅知縣周鍾瑄的曉諭，因此可以看成是熟番版的請墾制度。如果是這樣的話，康熙五十四年底展開的臺灣生番歸化風潮，主要的意義就不在於傳統中國文化主義理想，終於在清領三十年後於帝國海外邊疆的新領土具體落實；而是清初以來已在臺灣蓄積的龐大移民墾荒動能，跟朝廷突然轉變的移墾政策之相互遭遇後的新發明。

雖然康熙五十五年前後三份有關臺灣生番歸化最早的文件，都沒有出現漢人的身影，但相信沒有人會天真的以為，歸化一事純粹是出於生番自己的意願，由其主動且直接與官府交涉完成各種手續。實際上，作為中臺灣重要墾戶的張達京，肯定在這個特別的歷史過程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就像我們後來很快就會看到的那樣，以張家為主的漢人勢力主導岸裡地域的土地拓墾及水圳修築，控制了龐大的土地產權。⁷³熟番的利益很清楚，他們從漢民的拓墾過程中

⁷²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1編(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頁132-133。

⁷³ 關於岸裡地域的開發，可參閱：施添福，〈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變〉，收入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301-332；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

分得了部分墾地、水權以及租額。甚至，我們也不禁懷疑，地方官府特別是諸羅知縣周鍾瑄，肯定也是扮演著同樣積極的角色。⁷⁴畢竟從康熙五十年代後期的政治氛圍來說，皇帝及其朝廷為著文化主義的理想在邊疆臺灣的落實而歡欣不已；岸裡五社因為歸化成為官府在中臺灣控制也是帝國邊緣(大甲溪南)的主要盟友；漢民的拓殖開發不只有助於社會的安定與生產，也是縣官得以收足稅額的重要基礎。

九、「墾墾番地」模式

隨著「生番歸化」模式同時展開的是，由熟番土官等領袖具名立下契約，以無力完納繁重社餉為由，將其「祖遺草地」、社有之地給予漢墾佃拓墾，換取每年固定租額的風潮。從清領以來的請墾制度脈絡看來，「墾墾番地」的意義在於，整體型式外觀上凸顯「熟番地權」以及熟番在拓墾活動中的主動角色。誠如柯志明所說：「透過墾墾番地的方式，漢人取得開墾即使用土地的許可；然漢人既未報陞，即非該地法定之業主，番社名義上仍為田園之主」。⁷⁵

目前所見最早的案例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月諸羅縣熟番哆囉囑社，由「土官」大浮祿等五人具名立下契約，以無銀繳納繁重社餉

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48、53。邵式柏雖也注意到了岸裡社歸化及其土地控制、拓墾一事，但他卻僅視之為「常見的番地開墾模式之外建立的一有趣的變例」。邵式柏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頁 366。

⁷⁴ 前述康熙五十年代北臺灣開發辯論中，據稱知縣周鍾瑄有「清查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之請」，且似曾被落實，「前此越境有禁，人猶冒險以踰大甲」。岸裡五社准墾之地剛好在大甲溪南，無悖於周鍾瑄自己禁踰大甲溪北的議論。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188、191。

⁷⁵ 柯志明，《番頭家》，頁 85。

為由，在召集所有社眾討論之後，將該番社擁有之「十八重溪草地」，給予「漢人林、李兩家」募佃墾耕，⁷⁶條件是漢佃年貼納哆囉嚨社銀 52 兩，約為該社額徵餉銀的 17%。⁷⁷雖然契約中寫明該筆交易曾「當官呈明」，漢佃得「立戶推割課餉，永為千秋物業」，然實際過程並不清楚。但可以確定，本案非經官府請墾制度，最晚直到嘉慶二十年(1815)為止，仍被官府視為「番業民佃，例免陞科」。⁷⁸

類似哆囉嚨社的早期案例至少還有三件，全部集中在康熙五十八(1719)年。第一，康熙五十八年諸羅縣大武郡社，由「土官孩灣」具名，以「無鹿可捕，課餉無歸」為由，將該社所有之「壠港草地一所」，給丁文(丁作周)募佃前去開墾，換取年貼課餉粟 65 石。⁷⁹第二，康熙五

⁷⁶ 漢墾佃林、李兩家，應係該約未署名的「漢人林蕭敬、李元輔」。此地後來在乾隆二十四至三十年間(1759-1765)發生訴訟，諸羅知縣審斷時提及：「葉恒章之父葉茶瞻康熙五十六年間與李廷乙胞伯李元輔合墾十捌重溪草地，茶瞻應得拾分之一，元輔應得拾分之九。元輔物故，其子李廷選同姪李廷乙分管，廷選得五分，廷乙得四分」。據此，林、李兩家之持股比例為 1:9，林蕭敬可能很早就將 10% 的股份賣給了葉茶瞻，葉家後來在乾隆三十年紛爭時併購李家股權，取得完整業主權。此外，佔 9 成股權的李元輔，與藍鼎元所說拓墾十八重溪大埔庄的武舉李貞鎬是否有關，頗令人感興趣。藍鼎元說：「大埔庄……本哆囉嚨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社餉、招客民墾之者也」(請參閱本文第二節)。關於葉家，可參閱：黃典權，〈海澄大觀葉氏族譜研究〉，《臺南文化》，5:2(臺南，1956)，頁 20-48；施懿琳，〈鄭清對峙下一個閩南家族的遷徙與流動——以「海澄大觀葉氏族譜」為研究對象〉，收入施懿琳、陳益源主編，《2012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2012)，頁 163-186；戴文鋒主編，《東山鄉志》，頁 90-95。

⁷⁷ 哆囉嚨社額徵餉銀 313.992 兩。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175。

⁷⁸ 黃衡五，〈「海澄大觀葉氏族譜研究」補記〉，《臺南文化》，6:4(臺南，1959)，頁 112-117。

⁷⁹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臺北：臨時臺灣土地

十八年三月諸羅縣阿里山社由「土官阿貓里」具名，以「因本社餉課繁重，無可出辦」為由，將「本社界內番仔潭草地並埔林」，給「吳宅前去招佃，築陂開墾；但「每年公議納租三十石，貼本社餉銀」。⁸⁰第三，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吞霄社番立下「甘願交換契」字，將「自古紅毛時代祖遺番地」之荒埔林野，讓漢人李慈勤、鄭文誠、蔡大明等出首墾闢，交換條件則為「眾墾觀得各給番眾布匹玖佰疋、糖五百斤、火油壹佰斤」。⁸¹儘管此件文書看來並非毛筆書寫，部分文字讀來也是相當現代，是否為真約存在著高度的疑慮。但內容是同樣漢番私下立的合約，未經官府請墾制度。

儘管「墾墾番地」實質上跟康熙四十八年臺北大佳臘荒埔差不多，但兩者在法律形式上卻有莫大的差別，反映了康熙五十四年前後官府移墾政策的重大變革。從康熙四十八年陳賴章請墾大佳臘荒埔的案例看來，雖然漢民也是事先透過私約貼納社餉取得淡水社的認可後，才以荒地名義經由官府的請墾制度，取得合法的墾權。其方法和「墾墾番地」的差別似乎僅在於，後者最後未經官府請墾手續。然若從清領以來臺灣官府的長期立場看來，上述的差別就是「荒地」與「番地」，亦即無主荒地與熟番地權的差別。畢竟在清初請墾制度的架構之下，是由漢民將「荒地」請墾陞科之後，登記為漢民之

調查局，1904），中卷，頁 5-7。

⁸⁰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臺北：南天書局，1994，據刀江書院 1928 年版影印），下卷，頁 679-680。

⁸¹ 陳水木、潘英海編，《道卡斯蓬山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頁 51；〈康熙五十八年烏納吞霄等立甘願交換契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古文書》，登錄號：20040010880。「康熙五十八年吞霄社立甘願交換契」，亦是目前所見最早蓋有手摹的契約。李文良，〈番語與手印——新港文書的清代歷史學研究〉，《師大臺灣史學報》，11（臺北，2018），頁 1-32。

業；「墾墾番地」則必須始終維持著熟番地權的形式。這也就是本文一直強調的，康熙五十四年朝廷改變移墾政策之後，必須凸顯熟番地權。所以，重點應該不在於，漢人為了逃避高額正供稅率，透過「墾墾番地」模式，將土地隱藏在熟番名下。而是原本可以將番地以荒地名義合法請墾的模式，在康熙五十四年之後因為朝廷及省府的積極查禁，已經難以施行。當時稍微有些政治敏感度的縣官們，應該不敢再像以前般隨意核發墾照，不管土地實際上究竟是番地還是荒地。我們也認為，若是政治環境許可，漢人恐怕還是比較樂意走完最後一道請墾陞科的手續以合法控制地權，儘管因此需要向官府繳納些稅額。

瞭解「熟番地權」在康熙五十四年之後的成立過程，也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邵式柏有關清初治臺政策的討論。邵式柏在其專書《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中，據以佐證清廷熟番保護政策核心的是「番大租」的制度。但他認為，「番大租」是清朝官員主動仿效「漢大租」並經由司法裁判為其所創設，且日後成為各地仿效的慣習。邵式柏的根據來自於一份標明為康熙六十年寫成的契約「下淡水社雙語文書」中，鳳山知縣對於漢番土地糾紛的訴訟裁決，要求漢佃每甲田年納熟番租穀 7 石，而該項租額跟一般的漢民大租相當。⁸²然而，從本文的討論看來，清代臺灣的「熟番地權」，與其說是清廷基於護番的治臺政策考量而主動創設，毋寧說是在康熙五十四年皇帝突然關切移墾制度後，才在地方社會的利益(可能也包括地方官)以及朝廷期待的折衝之下，意外被創造出來的。

正因為如此，康熙五十四年後到雍正二年之間，幾乎就沒有看到

⁸² 邵式柏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頁349-353。

所謂的請墾荒地的文件，反而是這種強調熟番地權的「墾墾番地」之安排。⁸³請墾制度重新恢復(縣官重新核發墾照)，就筆者管見，就是到了雍正二年底彰化知縣談經正，相繼核發鹿仔港及布嶼稟荒埔。⁸⁴最能具體說明康熙五十至雍正二年間臺灣請墾制度之變化的是，舊稱張鎮庄的臺中盆地之案例。該地最早是在康熙四十九年，由臺灣副將張國「報墾立戶陞科」，顯係經由請墾制度；康熙五十八年九月，因生番殺死庄民9人，總督滿保下令劃出界外，開除課額。但雍正二年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1664-1730)與已升任浙江定海總兵的張國，意圖復墾，私下與貓霧棟及大肚社談妥年納社餉240兩後，「立戶名藍張興，赴彰化縣知縣談經正處請墾。談經正調集相關各社熟番查詢，問明果無妨礙，並確認該地四至後，給發墾照，准予開墾，並出示曉諭公眾」。⁸⁵

值得注意的是，跟雍正二年重啟請墾制度而發生的變化趨勢還有以下兩點：一、雍正二年戶部覆准「福建臺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令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清廷對臺灣的熟番地政策開始了大幅度的調整」；⁸⁶二、「生番歸化」風潮即於雍正

⁸³ 就筆者管見，現存康熙五十四至雍正二年間核發的開墾文件，只有康熙五十七年諸羅知縣發給舉人蘇學海報墾東西煙莊(今臺南市楠西區，曾文溪上游新寮溪谷地)的曉諭。然此案看來似乎是私墾被舉報，再補完成程序。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1卷上，頁60；〈大租二關スル舊記書類(臺南廳)〉，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422006。

⁸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上卷，頁8-9；〈大租二關スル舊記書類(斗六廳)〉，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422043。值得注意，開臺舉人蘇峨請墾的茅港尾，其浮復地之爭奪同樣起於雍正二年。

⁸⁵ 柯志明，《番頭家》，頁75-77。

⁸⁶ 柯志明，《番頭家》，頁107。

三年停止。接下來的雍正年間，就是施添福、邵式柏等人早已觀察到的雍正朝積極殖民化的開端。⁸⁷

十、結語

臺灣自康熙二十三年納入清帝國版圖以來，直到康熙五十四年夏天為止，幾乎一整個康熙年間都處於鼓勵招民墾耕的時代。其間甚至在康熙二十五至三十一年以及康熙四十一至五十四年，有過兩波官府積極主動勸獎開墾的時期。

清代臺灣的土地開發採行的是「請墾制度」，只要非屬民番的「荒地」，百姓即可具稟向所屬知縣提出申請，經知縣查證確實無礙民番後，發給申請人墾照、告示等文件，讓他們招佃前往拓墾，最後再由官府派遣書役前往丈量陞科。雖然如此，請墾制度實際上因為法規與時代之不同，而有「募墾」、「報墾」以及「勸墾」的差別。更重要的是，請墾制度的差別反映了臺灣農墾、商貿以及社會的階段性發展。整體看來，「勸墾」以及「報墾」政策下每年田園陞科數目，相較於清初的「募墾」時期明顯偏低。這有可能是，康熙三十年代以後，來自朝廷增加臺灣稅收以減緩財政缺口的壓力已經沒有清初那麼的大，掌握墾荒大權的縣官們也就不願意土地如實陞科，給自己找麻煩。

清領之後長期且積極招民拓墾政策，在康熙五十四年夏天有了急遽的轉變，在康熙皇帝突然而來的明確指示之下，地方各級官員只好強力廢止招民墾耕的政策。由於地方現在將「荒地」等同於「熟番地權」，制度上的墾荒主角須從漢民轉變為熟番，同時凸顯熟番地權。

⁸⁷ 邵式柏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頁359-366。

這就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二年期間，臺灣突然發展起來的「生番歸化」以及「墾墾番地」的新模式，而兩者均凸顯荒地屬於熟番地權。而這也警示我們，現在要討論清初治臺政策，就不能簡單使用「封禁」與「開發」來對應康熙或雍正等朝代。

(本文於 2020 年 4 月 25 日收稿；2020 年 11 月 29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重思清代臺灣史的研究架構：從清初治臺政策的反思開始」(計畫編號：MOST108-2410-H-002-042-MY3)的成果之一，初稿曾以〈募墾、報墾與勸墾——重思康熙年間臺灣的請墾制度〉為題，在國立成功大學「2019 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附錄 乾隆《重修臺灣縣志》，卷4，〈賦役志·田賦〉(部分)

原額：田園八千五百六十一甲八分二釐零。(按內地田園論畝，二百四十弓為一畝，六尺為一弓。臺郡田園論甲，每甲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計一甲約內地十一畝三分一釐零。雍正九年，題准自七年以後，新墾田園援照同安下沙則例，化甲為畝，每一甲折一十一畝。詳見下)內：田三千八百八十五甲六分四釐四毫零(內：上則八百五十七甲二分一釐七毫零，每甲徵穀八石八斗，中則七百八十七甲五分九釐三毫零，每甲徵穀七石四斗；下則二千二百四十甲八分三釐三毫零，每甲徵穀五石五斗，園四千六百七十六甲一分七釐八毫零(內：上則二百五甲三分五釐二毫零，每甲徵穀五石；中則一千三百六十七甲八分二釐八毫零，每甲徵穀四石；下則三千一百二甲九分九釐七毫零，每甲徵穀二石四斗)，共該徵穀三萬九千六百四十一石五斗五升七合八勺零。

新墾並鳳諸二邑割歸田園，共四千三百一十三甲七分一釐零。內：康熙二十四年新墾(凡募墾、報墾、勸墾田園，俱於次年起科，惟里民自實者，遵照部文即於自實之年起科)田園四百一十八甲二分一釐四毫零(內：上則田一百一甲五分四釐五毫，中則田一百二十二甲三分六釐，下則田一百一十四甲七分六釐四毫。上則園一十九甲六分三釐，中則園二十五甲三分，下則園三十四甲六分一釐五毫零。徵穀例俱同前)。

二十五年募墾田園一百一十六甲三分八釐五毫零(內：上則田三分三釐五毫，中則田二甲五分一釐五毫零，下則田一十二甲四分八釐一毫零。上則園一甲五分九毫零，中則園一十四甲九分四毫零，

下則園八十四甲六分二釐零)。

二十七年募墾田園三百三十二甲四釐九毫零(內：中則田三甲八釐二毫零，下則田三十三甲九分五釐六毫零。上則園三甲七分二釐零，中則園三十六甲四分八釐，下則園二百五十四甲八分一釐一毫零)。

二十八年募墾田園九十九甲九分五釐一毫零(內：上則田一分五釐，中則田二甲四分，下則田二十四甲三分九釐一毫零。中則園一十三甲五分五釐七毫，下則園五十六甲四分三釐三毫)。

二十九年募墾田園二百一十一甲八分三釐九毫零(內：中則田六分三釐零，下則田一十一甲六分五釐五毫零。上則園七分，中則園一十六甲五分七釐九毫，下則園一百八十二甲二分七釐四毫零)。

三十年募墾田園八十七甲八分三釐一毫零(內：上則田五分一釐，中則田八分四釐四毫零，下則田四甲二分五釐七毫零。上則園三甲八分，中則園一十甲九分一釐三毫零，下則園六十七甲五分五毫零)。

三十一年募墾田園一百九十甲一分三釐三毫零(內：中則田二分四釐六毫，下則田五甲一釐一毫零。中則園四甲四分一釐，下則園一百八十甲四分六釐五毫零)。

三十二年里民自實二十九、三十兩年新墾田園三百三甲三分四釐一毫零(內：下則田一十甲五分。中則園二十五甲六分五釐四毫零，下則園二百六十六甲九分八釐六毫零)。

三十二年報墾田園二十六甲三分二釐零(內：下則田一甲二分五釐。下則園二十五甲五釐二毫零)。

三十五年報墾田園三十三甲七分一釐(內：下則田九甲九分二釐。下則園二十三甲七分九釐)。

三十六年報墾田園一百四甲一分六釐二毫(內：下則田八甲九分三釐。

中則園二分，下則園九十五甲三釐二毫)。

三十九年報墾田園一十一甲一分四釐(內：下則田三分。下則園一十甲八分四釐)。

四十年報墾田園九甲九分六釐(內：下則田二分。下則園九甲七分六釐)。

四十一年勸墾田園一十三甲七分(內：下則田二分。中則園二甲，下則園一十一甲五分)。

四十五年報墾田園七甲六分(內：下則田一甲七分。下則園五甲九分)。

四十六年報墾下則園三甲五分五釐。

四十七年勸墾下則園二十八甲八分九毫零。

四十八年勸墾下則園一甲一分三釐。

五十一年勸墾下則園一甲五分。

雍正三年羅漢門撥歸邑轄下則園七甲(以上徵穀例俱同前)。

六年首墾報明於七年入額田園一百六甲三分一釐九毫零，俱下則。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0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 王小虹等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10、11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
- 王禮主修，《臺灣縣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4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
- 何丙仲、吳鶴立編纂，《廈門墓誌銘匯粹》，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
-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
- 李丕煜主修，《鳳山縣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5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
-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3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5。
- 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 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臺灣府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2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4。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古文書》，登錄號：20040010880。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4422038、00004422006、00004422043、00004414002、00004415026。
-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岸裡大社文書》，編號：AH2384。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據清康熙張伯行編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影印。

連橫，《雅堂文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0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陳水木、潘英海編，《道卡斯蓬山社群古文書輯》，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2。

陳璣，《陳清端公文選》，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9 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蔣師轍，《臺游日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4。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臺灣土地慣行一斑》，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

藍鼎元，《東征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二、近人論著

尹章義，〈臺灣↔福建↔京師——「科舉社群」對於臺灣開發以及臺灣與大陸關係之影響〉，收入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 527-583。

石萬壽主纂，《永康鄉志》，臺南：永康鄉公所，1988。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臺北：南天書局，1994，據刀江書院 1928 年版影印。

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 朱德蘭，〈清康熙年間臺灣長崎貿易與國內商品流通關係〉，《東海學報》，29(臺中，1988)，頁 129-148。
- 朱德蘭，〈清康熙雍正年間臺灣船航日貿易之研究〉，收入金祥卿主編，《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6，頁 421-451。
- 李文良，〈民田與請墾制度——清初臺灣田園的接收與管理〉，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頁 27-56。
- 李文良，〈番語與手印——新港文書的清代歷史學研究〉，《師大臺灣史學報》，11(臺北，2018)，頁 1-32。
-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增訂版。
- 林竹貞，〈六堆忠義祠與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之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施志汶，〈清康熙乾隆三朝的治臺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入詹素娟、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33-112。
- 施添福，〈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變〉，收入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301-332。
-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
- 施懿琳，〈鄭清對峙下一個閩南家族的遷徙與流動——以「海澄大觀葉氏族譜」為研究對象〉，收入施懿琳、陳益源主編，《2012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2012，頁 163-186。
- 柯志明，〈岸裡社的私有化與階層化——賦役負擔與平埔族地域社會內部政經體制的形成和轉變〉，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頁 57-132。

-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 洪麗完，〈族群互動與遷徙、擴散——以清代哆囉嘓社人遷徙白水溪流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8：4(臺北，2011)，頁 1-55。
- 張世賢，《晚清治臺政策(1874-1895)》，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
-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
-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陳志豪，〈清代臺灣的番屯制度與墾莊建構——以竹塹地區的九芎林莊為例〉，《臺灣史研究》，20：2(臺北，2013)，頁 1-30。
- 陳國棟，〈臺北與海洋——現實生活與集體記憶〉，《臺北文獻(直字)》，156(臺北，2006)，頁 1-19。
- 湯熙勇，〈論清康熙時期的納臺爭議與臺灣的開發政策〉，《臺北文獻(直字)》，114(臺北，1995)，頁 25-53。
- 黃典權，〈海澄大觀葉氏族譜研究〉，《臺南文化》，5：2(臺南，1956)，頁 20-48。
- 黃富三，《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 黃衡五，〈「海澄大觀葉氏族譜研究」補記〉，《臺南文化》，6：4(臺南，1959)，頁 112-117。
- 劉正剛，〈清前期四川和臺灣移民政策之比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成都，1996)，頁 87-95。
- 鄭瑞明，〈清領初期的臺日貿易關係(1684-1722)〉，《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4)，頁 43-87。
- 盧嘉興，〈八掌溪與青峰關〉，《臺灣研究彙集》，22(臺南，1982)，頁 90-125。
- 戴文鋒主編，《東山鄉志》，臺南：東山鄉公所，2010。
-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大小租業〉，《臺北文獻》，4(臺北，1963)，頁 1-48。
- 蘇峯楠，〈〈赤崁耕地圖〉所描繪的 17 世紀中期臺南地景及其歷史空間〉，收入劉益昌、Ann Heylen(賀安娟)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早期南瀛》，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9，頁 29-80。

三、網路資料

雲海龍吟，〈柴頭港溪「石頭坑」探索〉，<https://c931011106.pixnet.net/blog/post/232143911>，
擷取日期：2020 年 12 月 11 日。

Land Reclamation Regulations and Aborigine Land Rights in Early Qing Taiwan

Wen-liang Le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nd reclamation in Qing Taiwan (1683-1895) followed the standard procedure generally called “qingken (請墾).” Civilians could apply for cultivating the island’s empty land and magistrates issued permits and announcements, entitling the applicants to recruit tenants to perform the actual reclamation. This paper offers an in-depth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ree major types of the qingken system during Kangxi reign, namely muken (募墾, government-sponsored and civil service degree-holder-led reclamation), baoken (報墾, civilian-initiated reclamation), and quanken (勸墾, official-encouraged and civilian-performed reclamation). I furth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aboriginal land policy in 1715 and two new modes of land reclamation practice by mountain and plains aborigines between 1715 and 1724. The research thus argues against the neglect thesis of Qing frontier policy and the dichotomic view of Kangxi’s and Yongzheng’s policies towards Taiwan.

Keywords: land reclamation regulation, aborigine land rights, Qing policy on Taiwan, Kangxi reign, people’s property